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 认识论研究：

文化视界及其他

陈建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 认识论研究：

文化视界及其他  
藏书

陈建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论研究:文化视界及其他/陈建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203-0207-4

I. ①认… II. ①陈… III. ①认识论—文集 IV. ①B0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595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齐 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270千字  
定 价 69.00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

韩愈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有两个重要经历，都是托伟人邓小平同志的福而铭刻于心。一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后首次高考，1977年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90年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全日制学历，成就了我人生中一段学术研究生涯。二是在南方谈话感召下，1993年博士毕业后我一头扎进深圳经济特区桥头堡罗湖区，从区委副主任科员起步开始新的职业生涯，经济特区的大环境和罗湖区的基层磨练让我不知不觉间从“读书人”蜕变成“经济人”，从“秀才”变成“硬汉”。2013年我曾出差北京，与中国人民大学时期的研究生同学聚会，许多同学都讲我去深圳丢掉学问蛮可惜的。在深圳20年了，同学见面仍不断提起我当年做学问的那些事，过去的学术生涯已然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部分，值得我认真梳理珍重。

1987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刚踏出校门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这开启了我登堂入室做学问的大门。从1987年至1995年发表论文43篇，其中国家一级核心刊物3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6篇。我的博士论文是《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答辩通过后曾拆开陆续发表16篇，其他27篇论文大体仍属于认识论研究范畴。现在把博士论文和从27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14篇集结冠名《认识论研究：文化视界及其他》出版，并对个别引文按新版本进行了校定。

从《哲学研究》首次发表论文至今整整30年，我从繁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用心梳理早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并集结出版，目的是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以历史文献方式保存下来，成为在我晚年生活中偶尔翻阅唤起温馨回忆、铭记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向青春致敬，向母校感恩。

作者

2017年7月

# 目 录

|                     |     |
|---------------------|-----|
| 导论 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 ..... | (1) |
|---------------------|-----|

## 第一部分

### 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博士论文)

|                        |      |
|------------------------|------|
| 第一章 传统认识论研究的科学视界 ..... | (5)  |
| 第一节 科学视界确立的文化背景 .....  | (5)  |
| 第二节 科学视界的致思倾向 .....    | (7)  |
| 第三节 科学视界的消解 .....      | (13) |
| 第二章 现代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 ..... | (19) |
| 第一节 文化的界定 .....        | (19) |
| 第二节 文化视界的界定 .....      | (21) |
| 第三节 作为研究纲领的文化视界 .....  | (28) |
| 第三章 我在故我思 .....        | (42) |
| 第一节 传统与主体视界 .....      | (42) |
| 第二节 语言、共同体与认识模式 .....  | (55) |
| 第三节 交往实践与主体间性 .....    | (64) |
| 第四章 回到生活世界中去 .....     | (73) |
| 第一节 人的“生活世界” .....     | (73) |
| 第二节 前科学、前概念与前逻辑 .....  | (81) |
| 第三节 生活经验 .....         | (90) |

## 2 目 录

|                       |       |
|-----------------------|-------|
| 第四节 意识形态 .....        | (98)  |
| 第五章 非形式合理性 .....      | (106) |
| 第一节 合理性辨析 .....       | (106) |
| 第二节 价值合理性 .....       | (108) |
| 第三节 批判合理性 .....       | (115) |
| 第四节 历史合理性 .....       | (120) |
| 第五节 实践合理性 .....       | (127) |
| 第六章 保持两极张力 .....      | (135) |
| 第一节 保持两极张力的必要性 .....  | (135) |
| 第二节 科学与非科学的互补关系 ..... | (138) |
| 第三节 科学与艺术的会通 .....    | (144) |

## 第二部分

### 认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和理论向度(学术论文)

|                           |       |
|---------------------------|-------|
| 二十世纪科学认识中的主体创造 .....      | (163) |
| 论科学认识数学化的内在原因 .....       | (172) |
| 对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再认识 ..... | (185) |
| 论客观相对性和主观相对性 .....        | (197) |
| 论理论对事实的超越性 .....          | (206) |
| 考察前提知识的认识论意义 .....        | (215) |
| 消解逻辑经验主义的方略——预设前提 .....   | (219) |
| 关于文化的一般规定 .....           | (222) |
| 人、文化和价值 .....             | (225) |
| 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及其文化内涵 .....      | (231) |
| 关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认识论思考 .....   | (238) |
| 略论科学哲学化 .....             | (243) |
| 现代语言哲学观 .....             | (250) |
| 论符号的认识功能 .....            | (258) |

## 导论 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

“视界”一词是用以描述认识活动 and 理解行为的文化背景特征或受语境束缚之特征的。人类的认识活动 and 理解行为既受文化共同体的制约，又受历史传统的制约，因而总是在确定的视界中进行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之中，即我们的预期框架、我们的以往经验框架、我们的语言框架中的囚徒。”<sup>①</sup>当然，我们随时都可以超越某个视界，但那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又进入另一个视界。

认识论研究乃是对认识活动进行认识，对理解行为进行理解，这种反思行为必须在确定的视界中进行，而这种视界不是由哲学家本人随意地加以选择的，它是由时代精神和主导文化形态所历史地给予的。也正因为如此，反思行为所需要的视界本身并未在自我意识水平上得到反思，这是认识论研究的一个特征。

现代哲学非常重视所谓“框架神话”，“范式”“研究纲领”“研究传统”“理论框架”“认识构架”等新概念不过是确认，对于人的认识来说，重要的不是你认识什么，而是你怎么认识，因为视界一旦确定，就已经决定了你能看到的世界将是怎样的。视界对于科学和哲学同样重要。科学革命根本上是视界的转换，同样地，认识论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演变和发展，也必须有一个视界的转换，其标志就是一种认识论研究的新视界之出现。

传统认识论或认识论的传统形态乃是把一种科学视界作为自己的分析构架、理论框架和研究纲领，这本身有其历史必然性。而现代认识论或认识论的现代形态则是以一种新视界——文化视界来确认自己，表明自己的

---

<sup>①</sup> [英] 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纪树立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302 页。

现代哲学特征。这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种新的视界就是一种新的选择。文化视界将为认识论研究提供如下可能。第一,提供新的思路。放弃由主体意识作为认识起点的传统取向,不是从“我思”入手,而是从“我在”入手,主体首先是“我在”,然后才是“我思”。“我思”本身是“我在”的一个存在方式。把认识本身作为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和文化表现形式加以研究,用“我在故我思”代替“我思故我在”。第二,拓展新的领域。以往科学视界所限定的认识论研究领域由于文化视界的引入而扩展,从科学世界进到人的“生活世界”,科学世界本身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哲学反思得以贯彻到底,追溯到前科学、前概念、前逻辑。第三,确立新的价值标准。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规范,把原来科学视界内视为不合理的東西合理化了,使“合理性”包容那些具有历史文化性质的所谓非理性,实际是“非形式合理性”。第四,找到解决二律背反的新方法。传统认识论中的一些二律背反若不超出原来的科学视界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产生这些二律背反的根源正是科学视界内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的方式本身。而在文化视界内一切都要重新审视,提出问题和看待问题的方式有很大不同,这样,传统认识论框架内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也将被解决。在文化视界内,“文化悖论”是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功能统一性决定了“保持两极张力”之必要。

研究主题和研究纲领是统一的。认识论研究的新视界不仅规定着现代认识论的研究纲领,而且也涵盖着现代认识论的研究主题,并与之相吻合。实际上,“我在故我思”“生活世界”“非形式合理性”与“保持两极张力”乃是现代认识论的主题性范畴,现代哲学家们提出和表达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包含着这些主题性范畴的意义内核。譬如,“共同体”“范式”“传统”“偏见”“先见”“前理解”等等明显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概念范畴都包含着“我在故我思”的意蕴,即把认识本身作为人的历史存在方式和文化表现形式加以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也表征着现代认识论的形态学特征。循着文化视界深入下去的认识论研究,将逐步改变认识论的原有形象,最终构建起现代认识论的体系大厦。

# 第一部分

---

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 博士论文)



# 第一章 传统认识论研究的科学视界

## 第一节 科学视界确立的文化背景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语境中的“传统认识论”特指西方哲学史上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认识论形态，它主要是以培根、笛卡尔、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著作为代表。并且以一种科学视界作为其认识论研究纲领。

科学与科学视界不同。科学是表达和陈述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的知识形态，科学视界则是依照科学意象和科学精神所体现的原则与标准衡量一切的价值形态；科学是对象性知识，科学视界则是反思知识本身的一种分析构架；科学是命题体系，具有非意识形态性特征，科学视界则是信念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特征。从科学到科学视界的转化，必须经过文化形态的中介作用，以使科学意象和科学精神在主导的文化形态中自然而然地提升为一种文化理想。

人类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神话般的信仰阶段、哲学反思的形而上学阶段和经验科学的实证阶段。在第一阶段，以神学为主，哲学从属于神学；在第二阶段，以哲学为主，科学从属于哲学；在第三阶段，以科学为主，其他文化都以科学为范例。当人类文明处于经验科学的实证阶段时，主导的文化形态必然是科学文化。

“文化形态”这一概念强调两点：（1）有一种形态学的关系，使一个文化的每一层面都统二为一；（2）任一文化要素都与其他文化要素并存且有一种相似。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所属的“形态”，它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艺术和宗教，仅仅是媒介物而已，这个形态经由它们将自身显现出来。在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主导文化形态的时代，自然科学产生出种种

科学模式,不但支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思维方式,也支配了哲学、文学、艺术等。最突出的就是,艺术、诗成了技术分析的对象,什么主题、层次结构,什么表达、再现、技巧,所有的研究都变成了实质上是计算的认识。二十世纪初,当毕加索和布拉克创立抽象艺术时,罗素和怀特海划时代的《数学原理》亦面世,抽象艺术和符号逻辑的同时产生绝非巧合,而是科学文化的整体表现:抽象艺术崇尚结构的美学,恰如逻辑组成结构的科学,两者都热衷于定型和次序。

“凡在科学必须发音的地方,就到处可听到科学的声音”(伽达默尔语)。科学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文化,它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给人类精神创造了新的思维形式和新的自由,这种新的思维形式和新的自由,是任何别的文化所创造不出来的,而且在每一精神领域中,它们都可以作为重要方法来使用,从而为其他文化提供一个重要范例。因此,从启蒙时代以来,自然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赖以有效地获取知识的专门方法,一直被视为知识范型,而其他文化也必须依据这个范型来衡量。

面对自然科学,其他文化不得不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传统认识论从笛卡尔到康德再到罗素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的。哲学家们是从自然科学作为已知的固定点的事实出发的,他们的问题与其说是从某种“更高的”立足点为科学辩护,不如说是表达新的哲学概念,这些新哲学概念是对科学发展的新情况作出的自我调整。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第四十节相当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为了其自身的稳妥性和可靠性,纯数学和纯自然科学不需要一个像我们处理它们二者那样的演绎。因为前者依靠它本身的自明性,后者(虽然出自纯粹知性源泉)依赖于经验及其普遍证实:纯自然科学不能完全拒绝经验证据,经验证据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作为哲学,它决不能模仿数学,尽管它有全部的可靠性,所以,对这两种科学之需要进行探究,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另一种科学——形而上学。”康德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可能性的先天条件的探究,不是想要为这些科学提供一个另外的辩护,而是想依据这些科学的范例对形而上学重新诠释,建立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正是康德式的哲学反思才构成传统认识论研究的科学视界。

## 第二节 科学视界的致思倾向

哲学史上,由“本体论研究”向“认识论研究”的转向是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的,他们二人不仅确立了认识论研究的主题,也确立了认识论研究的科学视界。培根在他的《伟大的复兴》的开首写道:“因而只剩下一条路——按照一种更好的计划使一切都从头另来,重新改造全部科学、艺术以及一切人类知识,把它们提高到一个合适的基础之上。”他还写道:“心灵本身从一开始就不能任其所欲为,必须每一步都有引导,就象机械所做的一样。”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则决心:“把我的思想安排得井井有条,先从最简单、最易于了解的事物开始,然后才能一步一步地上升到更复杂的知识”,并在每一点上“只有对我的心灵表现得如此清楚明晰,使我再也没有理由加以怀疑,才可能承认是‘真的’”。<sup>①</sup>培根和笛卡尔两人的语气尽管不同,但致思倾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力图使知识在不容置疑的基础上通过一些不容置疑的方法步骤合乎逻辑地建构起来。这种致思倾向包含着基础主义、方法论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认识论研究的科学视界就是通过基础主义、方法论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致思倾向来贯彻和实现的。

### 1. 基础主义的致思倾向

基础主义有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形式,前者以培根和笛卡尔为代表,后者以分析哲学为代表。前者直接想为知识寻找到一个坚实的、不容置疑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后者则要为知识提供证明,包括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在什么范围内是合法的,在什么范围内是非法的。传统基础主义和现代基础主义表现形式虽有区别,但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坚信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

哲学家们为什么要寻求一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呢?这是因为在近代,认为科学是由真的且已知为真的陈述所组成的绝对无误的信念,是理性思想中的主导传统,哲学关于知识与意见之间的基本区别,其主旨就是坚信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理由的基础上,即知识必须建立在某种合理论证的基础上。为了证明知识是绝对可靠的,必须有一个确认这种可靠性的权

<sup>①</sup> 转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5期,第17页。

威,这种权威必须是最终的,不是非推理的,而且它本身就构成知识,这种权威对古典经验论来说是通过观察得到的表述“确凿事实”的一类命题,对古典理性论者来说则是依靠理性直觉说明的最一般原理。它们被看作是自我证实的、因而不需要更多根据的知识基础。

基础主义的致思倾向在认识论研究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1) 寻求一种拥有至上权威的特殊认识形式,这种特殊认识形式代表着人类若要获得知识、从事研究或取得经验就必须接受的那些东西,它们一旦对人显现,就强制着人的心灵去相信它们。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洛克的简单印象、康德的先验范畴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都是一些拥有至上权威的特殊认识形式,它们本身就是真理,并因此而成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种致思倾向总是表现为,力图从各种文化和认识要素中分离出一种更好的、更基本的、更优越的单一要素以确立一种绝对的参照系。

(2) 寻求某种“意义不变性条件”,这种条件使知识成为知识,因而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违背的。例如,康德认为,如果没有他所说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与“思维形式”(因果范畴等),那么知识就不能存在,寻求知识就无从说起。而这种直观形式和思维形式不能被抛弃,甚至不能被修改,不论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可能作出何种发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尤其表现出对这种“意义不变性条件”的渴求。逻辑经验主义纲领的核心是,通过理论与观察的区分来说明“理论术语”是如何以“观察术语”为基础并得到解释的。理论与观察的区分在逻辑经验主义纲领中具有三种哲学功能。其一,充当意义标准:一切有意义的概念或术语都是从经验中获得意义的;其二,充当评价标准:一切有意义的命题或陈述都要参照经验来判断其真伪、可接受性与不可接受性;其三,充当选择标准:一种“中性的观察”就为比较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依据这种比较,选择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三种哲学功能都以一种“意义不变性条件”为前提,即假定“一切未来的理论将必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述,以使得它们在说明中的运用不影响所说的东西或要被说明的事实报导”。<sup>①</sup>

<sup>①</sup> [美] 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6页。

(3) 寻求确定性的标准,并把这种标准等同于某种既定的学科,不管它是数理科学还是经验科学。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指出:“我们只有把那些具有必然的确定性的知识称作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只包括经验确定性的知识,不是一种间接意义上和精确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我认为,在所有自然科学的特定领域中,我们发现只有数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sup>①</sup> 寻求确定性标准的哲学动机是从一种单一的真理的理想出发,以便使这种真理理想成为唯一的标准,成为认识的唯一标尺。和经典科学的神话一样,基础主义者追求科学解释自然的唯一语言,追求科学所依据的唯一原则,他们否认科学观点的多样性,否认理论原则的多样性,反对人们在不同认识体系之间作出自由选择。

## 2. 方法论中心主义的致思倾向

方法论与方法论中心主义不同。方法论的宗旨在于为科学行为提供一种规范,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了达到科学事业在认识上和实际上的目标,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方法论中心主义是哲学的一种文化理想,它根源于近代科学。把简单的自然过程用适当的实验剥脱出来,并把发现的定律用数学语言书写下来,这是近代科学创立的特殊方法,它为研究自然界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同时也首次使完全运用科学于对自然界的技术改造成为可能。近代科学的概念正是由此才同以往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法相区别,并因此而表现出自我确信。作为近代哲学之标志的自我意识的优越感就是同这种科学方法的自我确信相联系的,这在笛卡尔的著作中极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他的《方法论》赋予方法概念以一种新的统治一切的地位,而他的《精神指导诸规则》却把一种统一方法的思想看作是展示知识的一种新的思想形式。近代哲学的文化理想就是方法优先于事物的思想;凡具备方法上可知性条件的方能作为科学的对象。近代哲学家们都接受了这个认识论的前提,伏尔泰的《形而上学论》、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序言、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都力图阐明,研究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是与牛顿引入自然科学,并取得了如此丰硕成果的方法相一致的。

方法论中心主义的致思倾向在认识论研究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sup>①</sup> 转引自〔德〕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 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认识论传统一直企图表明,存在着一种达到实在性的准确表象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从“实践的”或“美学的”事物中取得一致性的方法,而要远为深刻和基础得多:它就是科学的范型,用以表征科学,一经被发现,就只是应用于产生知识,它本身不会根据这种知识而改变。I. 谢弗勒将这种方法论中心主义总结为:“在理论的历史变化下面……[有]一种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将每一个科学时代与此前的科学时代联系起来,这种不变性不仅包括形式推理法则,还包括假说面对经验检验和被比较评价的那些标准”。<sup>①</sup>

(2) 传统认识论奉行一个基本信条,即认为理性追寻的各种方法的整体,对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皆具备绝对的有效性,因而它赋予方法以一种统一的模式,让方法的合理性从单一的终极的基础上被推广到价值领域,并与一切社会文化相联系。十九世纪初,精神科学逻辑上的自我思考就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推广到其他文化形式之中。“精神科学”这个词首先是通过穆勒《逻辑学》的德文译者而被采纳的,穆勒在其著作中试图附带地概述归纳逻辑运用于“道德科学”的可能性,对此德文译者就称为“精神科学”。赫尔姆霍茨首次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作出区分,他强调精神科学有优越感的人道意义。然而,精神科学的逻辑特征却依然是一种从自然科学方法典范出发的推论。赫尔姆霍茨区分了两种归纳:逻辑的归纳和艺术本能的归纳,二者相应于两种科学: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对赫尔姆霍茨来说,自然科学的方法典范不需要一种认识论的制约,因此,在逻辑上他就能一贯地去理解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

(3) 当代科学哲学家坚持标准的论证,把方法论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用以区分知识与意见、科学与非科学、好的理论与不好的理论。他们提出各自的方法论模式,目的是用规则的绝对律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什么构成科学哲学家的内部历史,这取决于他的方法论哲学。“因此,所谓确凿事实的发现及所谓归纳概括,构成了归纳主义者的内部历史。事实的发现,鸽笼体系的建立,及其被所谓更简单的鸽笼体系所取代,构成了约定主义者的内部历史。证伪

<sup>①</sup> [美] L.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主义者的内部历史则突出了大胆的猜测，突出了据说内容总是不断增加的改进。尤其是成功的‘否定的判决性实验’。最后，研究纲领方法论强调重要研究纲领之间长期的理论和经验竞争、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以及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纲领的逐渐胜利”。<sup>①</sup>

### 3. 理性主义的致思倾向

几乎在每一种文明中都可以找到合理性，但是渗透到人类活动每一个领域的系统的理性主义，则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市场机制（非个人性）、科层制度、形式法律、宗教世俗化等等都围绕着理性化这个核心，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最一般特征，即是理性化或理性主义。按照韦伯的观点，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理性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的核心，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各有其对理性一词的很不相同的解释，而且他们也是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例如本体论层次、认识论层次、伦理学层次和政治学层次——上设想和追求合理性的。笛卡尔、洛克、霍布斯、莱布尼茨、斯宾诺莎、休谟和康德都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对世界的本质以及对关于这种本质的认识之探究遵循着某种可以被理性所承认的路线，并且使用着由理性所规定的方法。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认识）都必须有“逻各斯”，研究在现象背后并支配现象的逻各斯，才是哲学的最终目标。

理性主义的致思倾向在认识论研究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1）对于普遍性的渴望，相信和寻找共同的、一致的、本质的属性，以此作为理解任何事物的必要条件。理性显然同普遍性有一种直接关系，在理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总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一点在那些以纯粹理性为对象的科学，如数学和逻辑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对理性的信仰总是表现为对于普遍性的渴望。理性主义者力图建立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普遍语言，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有理性的人或对话共同体的成员将只有共同的规

<sup>①</sup> [英]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